

“反者道之动”丛书

反启蒙

季广茂 著

海外情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反者道之动”丛书

丛书主编 季广茂

反启蒙

季广茂 著

COUNTER-ENLIGHTENMENT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启蒙 / 季广茂著.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9

(反者道之动丛书)

ISBN 978-7-04-046055-1

I. ①反… II. ①季… III. ①启蒙运动—研究 IV.
①B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3427号

反启蒙

FAN QIMENG

策划编辑 孙璐 责任编辑 孙璐 装帧设计 张楠

责任校对 杨凤玲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印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7 字数 110千字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46055-00

“反者道之动”丛书总序

季广茂

“反者道之动”一语出自老子的《道德经》第40章。

众所周知,《道德经》由《道经》和《德经》组成。《道经》以释道为本,与西人所谓“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做法不谋而合;《德经》专论为人处世之道,与西人所谓“人生哲学”(philosophy of life)的追求异曲同工。老子论为人处世,主张因时而动,顺应自然,所谓“弱者道之用”(《道德经》第40章),是也。与此不同,老子论道,虽然认定“道法自然”,却又以“反者道之动”一语,道破“道”的秘密:“道法自然”的基本方式不是顺势而为,而是逆势而动。

“反者”之“反”,既指相反、反对,又指返归、返回。前者是对立,后者是由对立重返统一。前者属于动力论(dynamics)的领域,后者属于目的论(teleology)的范畴。两者虽然密切相关,但毕竟颇为不同。而且前者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后者,因为后者不过提供了一种乌托邦愿景

(utopian vision), 甚至只是一种幻象而已。

长流之水必有源, 繁茂之树皆有根, 对立和相对, 亦非无源之水或无根之木。要而论之, 对立和相对, 源于老子所谓的“道”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在“道”的内部, 矛盾的双方互为前提, 相互依存,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这样的矛盾不仅源于“道”, 而且见于“物”。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仅凭常识即可发现, 老子所言, 是何等的英明: “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形, 高下相盈, 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 恒也。”(《道德经》第2章)

也正是因为“道”有其固有的内在矛盾, 它才具有如此简明和完美的动力机制, 才能展示如此生机勃勃的内在动力: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 这个动力呈现的过程, 实即“道”的分化和外化的过程。自然界种种神秘莫测的变化, 诸如“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道德经》第9章), “夫物芸芸, 各复归其根”(《道德经》第16章), “飘风不终朝, 骤雨不终日”(《道德经》第23章), 等等, 皆为道的分化和外化之结果。

书于2500多年前的《道德经》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对我国, 而且对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透过它的视角, 以我国固

有的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来审视西方现当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不仅是有益的尝试，还会带来诸多的裨益。以往我们总是透过西方的视角，审视我们的现实。现在，我们也可以透过中国的视角，把握西方的事态。至少，我们可以据之描述西方现当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面貌、特征和走向，发现其“有无相生”的基本规律。

进入 20 世纪后，西方思想界、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开始大规模地对近代以来的诸种文化思潮（这些思潮通常被冠以“现代性”之名）和社会思潮进行广泛、深入和长久的反思，甚至进行激烈的反抗或彻底的反叛。作为如此反思、反抗和反叛的结果，种种“反”字当头的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开始大量涌现。它们不仅对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给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反启蒙、反文化、反建制、反英雄、反艺术、反唯实论、反乌托邦、反全球化、反现代化、反智主义、反美主义、反人本主义、反权威主义、反女权主义、反民族主义、反消费主义、反基建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科学主义等等“反”字当头的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均为“反西方”的“西方主义”，因而呈现令人眼花缭乱的悖反

(antinomies)之势:是“西方”的,但常常打着“反西方”的大旗;虽然“反西方”,毕竟还是没有跳出“西方”的窠臼,没有消除“西方主义”的嫌疑。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它们不只是对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反叛、反抗、反击、反驳、反感、反攻倒算、反唇相讥、反目成仇、反其道而行之,而且是对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反观、反思、反省、反刍和反馈。从这个意义说,“反”派思潮也是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另一面,甚至是对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深化和延续。从长远看,它们不仅没有阻止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发展,反而推进了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进程。

西方的现当代思想史和社会史就是由“正”而“反”的历史,而“反”不是对“正”的简单否定,而是对“正”的调整和强化。由“正”而“反”的过程,也是黑格尔所谓的“扬弃”的过程。与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相比,黑格尔的“扬弃说”能使我们更好地领悟“正”与“反”的互动关系。

在黑格尔看来,“扬弃”是对全部直接的、物质性的传统和现实的直接扬弃,是对被扬弃的传统和现实的语

境的彻底剥离。扬弃把被扬弃之物的大量丰富的特征、属性，化约为固定、僵死的规则、符号和原理，因而无异于是对被扬弃之物的“羞辱”。一旦被扬弃，一旦经历了如此的“羞辱性过程”（mortifying process），被扬弃之物的生命的直接性就会暂时丧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扬弃的过程是从“绿色”的生命直接性迈向“灰色”的概念性结构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本质性的决断”（essential determinations），而我们无法凭借直接的经验来认识和把握这种本质性的决断。倘若没有经历扬弃的过程，倘若我们一味注重现实、历史和传统的“正”的一面，而忽略其“反”的一面，我们的认识就会永远处于原始的认知状态。

柏拉图就曾经把“现实性”化约为“可能性”，把“实然性”化约为“应然性”，因为他总是把理念赋予事物，而把理念赋予事物，就是把某个“道义之维”（deontological dimension）赋予该物：不仅指出它是什么，而且指出它应该是什么，使“应该是什么”成为我们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真正现实的核心，同时凸显真正现实的内在潜力和丰富的可能性。

这是化约，这也是决断，化约和决断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化约和决断，恰恰是扬弃的两个方面。通过化约

和决断（即扬弃）来审视世界，其实就是透过众多潜在性之镜（lenses of the potentialities）来领悟周围世界的现实性。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通过化约和决断（即扬弃）来审视世界，就可“设置”周围世界的现实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派思潮可以使我们的认识登上新台阶，进入新阶段。透过它们，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西方思想的最新走向，而且可以明察西方思想发展的内在机制。

或许这就是这套书的价值之所在。

目 录

导 言 /001

第一章

反启蒙与启蒙的关系 /007

第二章

启蒙运动的基本性质 /013

第三章

启蒙运动的主导倾向 /019

第四章

观察反启蒙的两个视角 /039

第五章

反启蒙,究竟为了什么? /065

第六章

革命前的忧心忡忡 /079

第七章

革命后的深刻反思 /093

第八章

从阴谋论到神义论 /101

第九章

浪漫派的激情反击 /113

第十章

对理性的改写与重释 /125

第十一章

突显宗教的美学之维 /133

第十二章

以启蒙之道还治启蒙其身 /143

第十三章

极权主义与启蒙运动的结盟 /153

第十四章

非理性与非理性的两军对垒 /159

第十五章

被辩证的启蒙终于成了帮凶 /167

第十六章

极权与民主:被包办的婚姻 /177

第十七章

反抗虚无主义:绝境难逢生 /187

结 语 /203

主要参考文献 /205

后 记 /209

导言

本书旨在描述和分析西方反启蒙的思想历程。本书的基本预设是，西方现代思想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启蒙的历史；反启蒙并非仅是一味地反抗启蒙运动，它还对启蒙运动进行反思，因而也是对启蒙运动的启蒙，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健康发展；“启蒙运动”是回溯性地建构起来的，是在启蒙运动的政治目标得以实现之后被追加的命名。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反启蒙，就没有启蒙运动。

本书首先厘清某些重要概念，其次简要探讨启蒙运动的基本性质、主导倾向及哲学思想，最后简要勾勒反启蒙的思想历程和文化风貌。启蒙运动是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高度引人注目的历史时代，是一场高度自觉、诉求明确、席卷欧洲、波及全球的运动，是由一套扩散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特定观念促成的思想潮流，是特定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文化精神。启蒙运动推崇理性，主张怀疑，反对教权，解剖人性，推动进步，重视自然，

珍视自由。反启蒙与启蒙运动相伴而生，但不同的反启蒙者攻击启蒙运动的不同方面，并提出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诉求。18 世纪支持传统宗教的保守派攻击启蒙运动，说启蒙运动倡导的唯物主义和怀疑主义是邪恶的力量，直接导致了道德上的堕落。浪漫派哲学家指责启蒙运动对理性的张扬使人过度依赖理性，忽略了历史、神话、信仰和传统所具有的强大的社会凝聚力。19 世纪的民族主义者指责启蒙运动追求适用于所有人的价值观念。他们主张文化多样化，反对道德上的一律。20 世纪的反启蒙者指责启蒙运动冷酷无情、不讲道德，只是痴迷于技术统治，盲目追求人性的完美化，结果导致了极权主义的泛滥。虽然早就有人使用“反启蒙”一词，但确立“反启蒙”在观念史上的地位的是以赛亚·伯林，他使读者意识到了作为一种思想潮流的反启蒙的存在。

一般而言，反启蒙通常是以理性为根基的，因而反启蒙也是启蒙的一种形式。尽管反启蒙者五花八门，立场迥异，并有悠久的历史，但他们不乏共同之处：第一，所有的反启蒙者都会描述他们心目中的启蒙运动，都要涉及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和孔多塞等核心人物（特别是前面两位）；第二，指责启蒙运动具有欺骗性和危险性；第三，指责启蒙运动滥用理性。

本书还简要地纵向梳理了从法国大革命到 20 世纪末的反启蒙的思想流变。卢梭最早批判启蒙运动，西方思想由此发生范式转型。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把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绑在了同一驾战车上，使人相信两者之间必定存在着本质性的因果联系。如此一来，痛恨法国大革命者必然痛恨启蒙运动，仇视雅各宾党人必然仇视启蒙哲人。笼罩在启蒙运动身上的阴影从此日益浓重，对启蒙运动的反抗更是风起云涌。埃德蒙·柏克认为，启蒙哲学在法国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法国大革命成了“哲学式的革命”。启蒙哲学误解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因而注定导致巨大的灾难。奥古斯丁·巴吕耶尔以阴谋论解释法国大革命，认为启蒙哲人、共济会和光明会联手策划了推翻法国政府与教会的活动。约瑟夫·德·迈斯特首先把法国大革命视为启蒙运动的结果，把启蒙哲人视为导致法国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上帝的“杰作”，但启蒙运动却是人的“杰作”，上帝要惩罚的就是人这一“杰作”：通过血腥的暴力，上帝在以其“看不见的手”对启蒙哲人做了严厉惩罚。尽管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极其恐怖血腥，但它伸张了正义，对法国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上帝惩罚法国人，是要拯救全人类，这和上帝牺牲耶稣拯

救世人完全相同。迈斯特还提醒世人，理性无法与天启（revelation）抗衡，应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

革命的风暴过后，浪漫的激情降临。浪漫派并不直接反对启蒙运动，它首先突显其局限，然后以新内容补充，最后证明启蒙哲人的主张存在缺陷。浪漫派无意维护法国的旧制度，但对启蒙哲人的“世界愿景”并不满意：那是一架冰冷的机器，没有人性，没有信仰，没有奥秘，因而无美可言。他们赞美中世纪，赞美前现代的基督王国，因为那个时代充满了精神性、宗教性和神秘性，因而是美的；他们期待的新时代，是宗教复兴、社会复魅的时代，因而也是美的时代。德国浪漫派的代表人物约翰·格奥尔格·哈曼认为，德国启蒙者体现出来的知性主义（intellectualism）和对超凡脱俗的抽象理论的喜爱，使他们远离了深深扎根于自然物质世界和历史的存
在，忽略了“肉体知性”的存在。英国浪漫派的代表人物柯勒律治要恢复情感在精神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但又不把理性拒之门外，或使理性屈从于情感，而是通过重新界定理性，把情感置于理性的核心地带。他认为，理性有一种神奇的能力，不仅能够使人直接看见“看不见的现实”和“精神性的物质”，还能指导人的现实行为。夏多布里昂为宗教辩护，但他的辩护是对浪漫的辩护，

也是对审美的辩护。他认为，宗教之美在于信仰本身具有精神性和神秘性，在于它蕴含着强大的直觉力量。

就反启蒙及其理念的激烈程度和深刻程度而言，无人能与尼采相提并论。尼采对启蒙运动的反抗，为反抗理性、进步、真理、道德和现代性提供了灵感和动力。他认为，西方过于重视和强调工具理性主义，重视理性必然忽视其他更为重要的人类机能，必然引发“知识肥大症”，必然使西方文化付出巨大代价。

19世纪初的反启蒙者把法国大革命与启蒙运动直接联系起来，20世纪的反启蒙者则把极权主义与启蒙运动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启蒙运动是极权主义的肇因。这时，反抗启蒙运动，成了左翼和右翼共同的事业。墨索里尼是尼采的一大知音，也是启蒙运动的反对者。希特勒上台后，戈培尔声称，1789年已从历史上一笔勾销。言下之意，启蒙运动已被剿灭。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走得更远，他直接越过了启蒙运动，直接进入了中世纪，把无意识视为人类精神的宝藏。马克斯·韦伯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是形式性的，后者是实体性的。在现代西方，工具理性一统天下。统治者从此可以在政治、社会、教育、宣传等方面，全方位地实施统治。这种统治是整体化和全能性的，统治者为所欲

为，被统治者则被关进了“铁笼”，故称之为极权主义统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分析形形色色的启蒙形式，破天荒地把启蒙与神话绑在了一起，并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发现了西方启蒙最早的证据，其中的奥德修斯就是已获启蒙的人，也是以理性控制世界的现代人的原型。始于奥德修斯的西方启蒙在起步时充分肯定了个人的价值。但到了20世纪，个人终于遭到了启蒙运动的反噬，其结果便是个人的销声匿迹。雅各布·塔尔蒙试图把“极权民主”与启蒙运动联系起来，探索“民主专制”的由来。在他看来，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冲突源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种认识论模式的针锋相对，因此当务之急是在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多元主义与极权主义、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之间保持平衡，不可偏废。莱斯特·克罗克、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和约翰·格雷等人认为，启蒙运动依据理性对道德所做的任何辩护均以失败告终，而且败得十分彻底。企图依据理性来证明道德是合法的和合理的，是徒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运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启蒙运动的失败直接导致了道德虚无主义。他们为此感慨唏嘘，却又无计可施。他们因此流露出悲观主义的气息，不仅合乎人性，而且合乎逻辑。

第一章

反启蒙与启蒙的关系

对概念、术语或范畴进行严格、准确和清晰的界定，永远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研究“反启蒙”，首先要把“启蒙”与“启蒙运动”、“反启蒙”与“反启蒙运动”严格区分开来。其次，研究“反启蒙”，不仅要关注对启蒙运动的反叛和反抗的过程，而且要关注启蒙运动“被建构”的过程。后者远比前者重要，因为要“反”某个目标，就不仅要为这个目标进行定位，还要掌握有关这个目标的整体面貌。掌握这个目标的整体面貌，难免就会有所虚构和想象，即是说，要“反”某个目标，首先要“建构”这个目标，而且目标总是与特定的利益、信仰、意见（或偏见）、议程相对应的。不同的人“反”启蒙运动的不同方面。有些方面是公认的启蒙运动“古已有之”的，有的则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向壁虚构。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思想可能同样重要，其影响可能同样深远。